

胡國治著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金園出版有限公司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著者：胡國治

編譯：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金園出版有限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2757號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245巷32弄18號 2樓

電話：(02) 7655367 • 7635122

郵政劃撥：542135吳日勝帳戶

印刷者：松民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貳佰貳拾圓正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第一章 表率詩風的建安詩壇	1
第一節 建安詩歌的社會基礎及其盛況	1
一 建安詩歌的社會基礎	1
二 建安詩歌的盛況	3
第二節 曹操與曹丕	6
一 曹操	6
二 曹丕	11
第三節 曹植	12
第四節 王粲、劉楨及其他詩人	23
一 王粲	23
二 劉楨及其他詩人	26
第五節 《悲憤詩》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30
一 《悲憤詩》	30
二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33
第二章 魏末及晉代詩風的變化	40
第一節 魏末的詩壇	40
一 魏末的政治局勢、學術思想與詩風	40
二 阮籍	42
三 嵇康	49
四 魏末其他詩人	54

第二節 晉代詩風的變化·····	56
一 晉代詩歌的社會背景及發展趨勢·····	56
二 陸機與潘岳·····	60
(一) 陸機·····	60
(二) 潘岳·····	65
三 左思·····	67
四 張協及同時其他詩人·····	72
五 劉琨與郭璞·····	78
(一) 劉琨·····	78
(二) 郭璞·····	82
第三章 陶淵明詩歌的卓越成就 ·····	85
第一節 陶淵明的生平及思想·····	85
一 陶淵明的時代及生平·····	85
二 陶淵明的思想·····	87
第二節 陶淵明詩歌的卓越成就·····	91
一 現實生活態度的表白·····	91
二 別開生面的農事歌咏·····	96
三 融注深情的景物描寫·····	100
四 遺世獨立的藝術風貌·····	103
第四章 南朝初期詩壇的新貌 ·····	108
第一節 耳目一新的劉宋詩壇·····	108
第二節 謝靈運·····	113
第三節 鮑照·····	117
第五章 南朝中後期詩壇的昏曉 ·····	124
第一節 南朝中後期詩風的趨勢·····	124
一 創作內容的涇渭·····	124
二 形式追求的功過·····	126

第二節	各種詩體的胎息孕育	130
一	七古的前進步武	130
二	律絕的胎孕誕育	134
第三節	齊梁之際的詩人	139
一	謝朓	139
二	沈約	141
三	江淹	143
第四節	梁陳之際的詩人	145
一	何遜	145
二	吳均	146
三	梁陳其他詩人	148
第六章	北朝文壇的異象	151
第一節	北朝文學的發展趨勢	151
第二節	《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	154
一	《水經注》	154
二	《洛陽伽藍記》	157
第三節	庾信及北朝其他詩人	161
一	庾信	161
二	北朝其他詩人	163
第七章	民歌藝壇的絢爛芳菲	166
第一節	鮮麗活潑的南朝樂府民歌	166
第二節	雄健樸實的北朝樂府民歌	173
第三節	傳奇式的英雄女性贊歌——《木蘭詩》	178
第八章	賦的發展變化	183
第一節	建安時代賦的發展趨向	183
第二節	晉代賦風的熾盛	190
第三節	南朝賦風的演變	199

一	宋齊賦壇的異采·····	199
二	梁代賦風的靡麗·····	206
第四節	庾信詞賦的老成·····	209
第九章	駢體文的發展 ·····	216
第一節	駢文發展的歷程·····	216
第二節	建安及魏末時期的駢文·····	223
第三節	晉代的駢文·····	232
第四節	南北朝時期的駢文·····	241
第十章	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發展 ·····	256
第一節	《典論·論文》、《文賦》及《文章流別論》 》·····	256
一	《典論·論文》·····	256
二	《文賦》·····	258
三	《文章流別論》·····	267
第二節	《文心雕龍》·····	270
第三節	《詩品》·····	281
第十一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 ·····	287
第一節	小說的溯源·····	287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	289

第一章 表率詩風的建安詩壇

第一節 建安詩歌的社會基礎及其盛況

一、建安詩歌的社會基礎

建安時期是我國中古時期文學史上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建安是東漢王朝最後一個皇帝獻帝劉協的年號（196～220）。時東漢王朝政權已掌握在曹操手中而名存實亡了。整個中國隨着東漢王朝統治力量的消亡，而產生了一次軍閥爭奪割據的大混戰，終於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分裂局勢。所以，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漢族建立的帝國一度由統一強盛而開始趨向分裂衰落的時期，但在文學史上却放射出一片絢美的異采，而這異采乃是從當時現實的土壤中熾升起來，與當時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息息相關的。

從一世紀末二世紀初起，東漢王朝的外戚和宦官迭互掌握政權，他們之間不斷進行尖銳的生死爭鬪，同時都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壓榨掠奪，終於激起靈帝劉宏中平元年（184）的黃巾大起義，隨而產生獻帝初平元年（190）的董卓之亂和以後的軍閥大混戰。經過這些大的戰亂，中原形成“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曹操：《軍譙令》）及“千里

無雞鳴，生民百遺一”（曹操：《蒿里行》）的慘象。當時人民的死亡和生產的破壞，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這種殘破不堪的現實社會慘景和生活於其中的慘痛經歷，却為當時詩人提供了極為真實生動的創作題材，並激起其不能不形之歌咏的創作情緒。

由於巨大的社會動蕩促使舊的封建秩序破壞，人們的意識也發生巨大的變革。原來由封建統治者極力提倡，而從其中形成人的道德行為規範的儒術，及以其精神為原則的用人制度，都在這非常的社會變亂中失去其對人們的支配力量，人們的思想意識乃從儒家的統治中獲得開放，曹操之本之刑名精神而採取的“用人唯才”的方針，正標誌着當時這種社會要求。曹操在其《求賢令》中說：“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不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涓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又在《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中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而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連“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也極力搜求。曹操在用人制度上的這一重大變革，確給漢代儒術的傳統以致命的打擊，因為漢代統治者之提倡儒術正是以利祿作為引誘的手段的。由曹操在用人制度上的這一重大變革，可以看出當時思想開放所達到的程度。這次思想的開放，對當時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巨大，使文人的創作思想的境界從儒家經典的束縛中開放出來，不必再加劉勰所說的那樣“華實所附，斟酌經辭”（《文心雕龍·時序篇》）了。於是它在內容上既不須依據經義而可自由抒情，它的不朽價值也由自身來決定而不必附驥尾於六經，這在當時文人的創作尤其是文學批評中已有明白

的反映。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即大膽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種對於文學價值的新認識當然極有助於文學的蓬勃開展，並使文學獲得豐富生動的內容。而當時詩人之開始勇於大量學習樂府民歌，並運用樂府古題來進行創作，也正由於這種開放的思想力量在支配着他們。

這時，由於曹操以其過人的軍事和政治才能統一了中國北方，使北方生產逐漸恢復，人民生活獲得安定，於是散在四方的文人也漸回到中原。更由於曹氏父子對文學的愛好和提倡，便形成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集團，及盛極一時的鄴下文風。因此，我們論到建安時期文學發展的因素，對於曹氏父子尤其是曹操的政治和人事上的作用是不能不適當估計到的。當然，這時期詩人創作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的還在於當時社會生活給予他們深刻的教育和豐富的題材。

二、建安詩歌的盛況

建安時代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是一個光輝的起點。這時新形成的五言體，開始在文人的詩歌創作中被普遍運用並盛極一時，從此，五言體詩開始了它的前進發展的歷程。這時詩人們學習和繼承了前代民歌的創作精神，在當時現實形成的各種條件下，運用各自的藝術才能進行創作，使他們的詩歌閃耀出強烈的現實主義光輝，成為後代文人詩風的良好表率。

這時文壇上一個嶄新的面貌，就是五言詩風暢開，五言詩代替了兩漢以來盛行的辭賦居於主要的地位。漢代樂府民歌的句式本來是長短不齊的，但也有逐漸向五言整齊化的趨勢，這正如周代民歌由長短不齊而形成整齊的四言一樣。東漢初期，

在民歌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文人詩歌，即開始有了完整的五言篇章，但這種新的詩歌形式，在文人中還未受到重視，所以作者很少。到了東漢末期，出現了許多在藝術上很成熟的人文創作的五言詩，可是大多是沒有作者的姓名，可見當時在文人心目中，五言詩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那些無名氏的五言詩，雖然在藝術上很成熟，但多是在黑暗重壓下消極生活情緒的流露，缺乏積極精神。到了建安時代，由於各種條件的滙集，大群知名詩人筆下產生的五言詩，才放射出強烈新異的藝術光彩，五言詩這時才成爲文人普遍運用的詩體，在此後的文學領域內，逐漸發展成爲一股巨流。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曾形容這時五言詩的盛況：“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當時曹丕就曾描述同時作者在創作上競爭的情狀：“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典論·論文》）曹植也說他們“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與楊德祖書》）而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追述他們的文娛生活說：“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這些都可想到他們在創作上的努力，及創作活動的頻繁，都是有利於當時詩壇的繁榮的。這時的作者，真可謂“俊才雲蒸”（《文心雕龍·時序篇》），除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外，重要的作家有所謂“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劉楨、徐幹、陳琳、阮瑀、應瑒等，另外還有繁（PÓ 婆）欽、應璩、邯鄲淳、吳質、杜摯、左延年、繆襲等，確是盛極一時的了。這時的詩人，尤其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多曾經過一番巨大的社會變亂，接觸到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實景，而當時社會思想的開放，也使文人的個性得以自由舒展，因而這時的詩歌表現出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慷慨任氣”。劉勰的《文心雕龍·時序篇》即曾明確地指出這

點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而其《明詩篇》也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織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裏所謂“造懷指事，不求織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乃是直抒對於現實的激情，而以準確樸素、明朗的言辭表達出來，使內容和形式有諸美的統一性，這也就是後世所稱道的“建安風骨”的實質。我們閱讀這一時期的許多優秀作品，它們都充沛着詩人由現實生活所激起的熾烈感情，他們悲愴民生疾苦，亟思聘其才力以改變現實，而這種感情在他們樸實而形象生動的語言中表現得極為明朗，因此產生出強烈的感染力，這正是《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的充分體現。後來唐代詩人陳子昂向往“漢魏風骨”，李白稱道“建安骨”杜甫所謂“漢魏近風騷”，都是對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精神的衷心推崇。

這時詩人所以取得巨大的藝術成就，與他們學習民歌分不開的。從兩漢流傳下來的樂府民歌，原是具有豐富的社會性和現實性的，這種可寶貴的樂府民歌的精神，對於生活在亂離中的文人自然會有啟發作用。而且在擾擾不安的生活環境中，詩歌是最適於採用的文學體裁，因此，這時的詩人，都廣泛地運用樂府古題，並吸取其現實主義精神，以詩歌抒寫其對於現實生活的親切感受。他們的這類創作與樂府民歌不同之點，乃是樂府民歌具有較多的客觀性質，而他們的詩歌創作則具有較重的主觀抒情性質。儘管他們都是文人，他們的詩歌語言比之樂府民歌大為精雅，但其中仍具有很大程度的樂府民歌的樸質成分。黃侃曾在《詩品講疏》中論建安五言詩說：“文采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故其稱物則不尚雕鏤，敘胸情則唯求誠懇，而又緣以雅詞，振其美響，斯所以兼籠前美，作範後來者

也”。這一段話很正確地指出了建安文人詩歌在語言上吸取民歌的樸質成分所形成的藝術特色。

這一時期的民歌，由於統治者未注意收集，流傳下來的很少，但却出現了一首長篇敘事抒情詩《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它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藝術性，標誌着兩漢民歌的最高成就。另外還有一首具有濃厚的民歌氣質的蔡琰的《悲憤詩》，它以長篇敘事的方式，詳盡地寫出了巨大的社會變亂，及在其中的一個婦女的悲慘遭遇，充分展示了五言詩的藝術表達功能。這兩篇作品同樣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文人們的創作相互輝映着這一時期的詩壇。

第二節 曹操與曹丕

一、曹 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省亳縣人）。他的祖父曹騰是中常侍（宦官），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作到漢代太尉的官。他雖出身於大官僚家庭，但因先代不清白，所以爲社會上高門所鄙視，因而不得不力求在功業上有所建樹以自表白，如他在《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他曾參加對黃巾起義的鎮壓。他後來以其卓越的軍事和政治才能，在與各地軍閥鬪爭中逐步勝利，終於統一了中國北方，在維護漢王朝的名義下建立了曹魏政權。他在爭鬪過程中，爲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不得不針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要求，採取一些較進步的措施，如屯田、抑制豪強兼并以及破格用人等，這一切對於安定社會和恢復生產是曾起一定的積極作用的。正由於

這種現實性的思想基礎，他的詩歌才能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殘破景象和人民疾苦，並表達出他的“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的積極奮發情調。他之勇於學習樂府民歌，並用樂府古題抒寫自己的現實感情，也是從這種思想基礎出發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曹操的詩歌全是古題樂府。他的樂府詩的最重要成就，乃是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他雖是用樂府古題進行創作，而內容則是對於當時現實社會生活的描寫及其激情的抒發。我們試看其《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個原是挽歌的樂府古題，他却利用其原來具有的悲哀情調，來敘寫令人感到傷慘的時事。作者在詩中嚴厲地指出袁氏兄弟對當時社會應負的罪責，由於他們的自私自利，使討董卓的軍事變為自夥的混戰。詩的末端極形象地概括地描繪出那些混戰所造成的社會慘象，表現出作者強烈的正義感。據史書記載，以袁紹為盟主的地方聯軍討董卓時，在非常有利的形勢下，大家都觀望不前，曹操獨自奮勇地帶着部隊去追擊董卓，在汴水一戰蒙受了重大的傷亡。由此可以證明他在這裏所表達的悲憤情緒是很真誠的。而那一時期混亂的產生、發展及其後果，都被按照生活本身發展的邏輯集中地反映在這短小的篇幅內，也顯示了作者從生活概括以至語言運用的藝術能力的高強。

與《蒿里行》內容相連的《薤露》，可說是《蒿里行》的

姊妹篇。詩人在其中沉痛地追訴了由於朝廷執政者的無能，乃釀成董卓的暴亂，使國家和人民遭受毀滅性的災難，極概括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重大的歷史事實。

在曹操的五言詩中，還有《苦寒行》和《却東西門行》，是兩首以軍事生活為題材的好詩。《苦寒行》是描寫他北征高幹時的行軍生活。其中如“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給人以非常艱險荒苦的軍旅生活實感。更看《却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餘里，行止自成行，
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
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
藏深泉，猛虎步高崗，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這首詩是寫戰士在長期行役中思念家鄉之情，而這種感情乃是用比興的手法，以自然界的事物，反、正比喻地表達出來，特別顯得痛切，同時也具有非常濃厚的民歌情味。這首詩出於當時一個軍事首領的筆下，是非常可貴的，它也體現了作者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它的“靖難”的事業雄心是相矛盾而又統一的。

自從漢初以來，隨着社會的發展，四言詩因句式短促，難運用來生動地表現生活，所以很少有成功的作品，而曹操以其充沛的感情、樸實的語言及雄健的氣勢，寫出了一些新鮮而富於感人力量的作品。如其一首《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首詩表達了他對於一個中心急欲爭取以爲己用的人那種可望而不可即的苦悶心情。詩的開始之感到人生短促，欲借酒來消解的憂愁，乃是從那種苦悶的心情中翻出的。儘管如此，但他仍不能忘懷，乃把這種心情曲折吞吐地抒寫出來，表現得那麼懇摯纏綿，一往情深。其中有許多《詩經》的成句，如“青青子衿”二句及“呦呦鹿鳴”四句，在他的充沛的感情及磅礴的氣勢的運用下，在整個詩篇裏達到融合無間，使人感不到一點補綴的痕迹。有人認爲這首詩乃爲懷念劉備而作，也有人認爲係因荀彧而作，因曹操想爭取荀彧贊助他取而代有漢政權而又難於明言。細玩詩意及有關的歷史記載，後說當較爲可信。“青青子衿”四句即影射所要爭取的人物。“呦呦鹿鳴”表示自己對於對方的愛賞及欲與之共享一切的心願。“明明如月”四句表達對於要爭取的人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苦悶心情。“越陌度阡”四句表示自己要去訪問對方，披懷暢敘。“月明星稀”四句以烏鵲之無可依止，形象地比喻自己猶疑不定的心情。最後四句提出解決的辦法，只有求其在己，虛懷待人，爭取人心的歸向。整篇運用比興的手法，以各種事物形象，比喻地表達自己複雜曲折的心情，吞吐隱約，非常耐人尋味。

曹操的《步出夏門行》四首，其中第一首《觀滄海》和第

四首《龜雖壽》特別值得注意：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

後一首大致言人生盡管終有盡時，但不應全聽自然的支配，還可以人事的努力，盡可能獲得人壽的延長，表現了對人生的積極態度，尤其是其中“老驥伏櫪”四句顯示了志士不甘衰老的奮發氣概，常爲後代無數英雄志士所擊節歌咏不置的。前一首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早見到的描寫大自然的作品，它是作者平定河北後，爲了消滅袁氏殘餘勢力而北征柳城，途經碣石時所作。詩中描寫作者觀望滄海的感受，從對於無邊壯闊的自然景象的描繪中，抒發了作者囊括四海的豪邁氣勢。而“日月之行”四句，以觀海時所產生的玄想，盡致地形容出水天空濶浩淼無邊的景象，是對大海的極妙形容。像這種通篇着重客觀地描寫自然景象的詩，在鮑照、謝靈運以前是很難見到的。

總結曹操在詩歌上的成就：首先他能衝破傳統的文人偏見的束縛，接受了漢樂府民歌的影響，運用樂府古題抒寫現實的生活和感情，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開文人擬古樂府而進行詩歌創作的端緒。其次，他在其樂府詩中真